

王昉 著

Facing the Loss
of Civilization

面对失落的 文明

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中的
人文主义倾向



南京大学出版社

王昉 著

面对失落的文明

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中的
人文主义倾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面对失落的文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中的人文主义倾向 / 王昉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5

ISBN 978-7-305-20097-7

I. ①面… II. ①王… III. ①人道主义—影响—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79660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面对失落的文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中的人文主义倾向

著 者 王 昉

责任编辑 卢文婷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鸿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11.5 字数 190 千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20097-7

定 价 36.00 元

网址：<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 孔范今

这部书稿是王昉博士的学位论文，完成于2009年春。当时在答辩中，老师们就认为这是一部眼光别具，很有开拓、创新价值的学术专著，应尽早予以出版。现在，时隔几年，它终于要付梓面世了，实为可喜可贺！

但凡一部优秀的学术论著，必有一个新学术论题的提出，并且能够展示出崭新的学术视野。而王昉这部专著令人关注之处，也正在于此。乍一接触其书题，大约会令人诧异：“面对失落的文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中的人文主义倾向”。这是什么意思？近一个世纪以来，人们惯常谈论的似乎都是在历史、文化的进步与变革中，中国文学如何进行现代转型发展，与本书题目的背景指向和文化价值关涉确有显著的差异。其实正是在这一差异中，该论题及其价值视域的与众不同才得以彰显。

该论著的核心概念是“人文主义”，理解它应该是认识和把握该论题价值的关键所在。所谓“人文主义”，书中有明确的界定，就是指关于人文文化的观念、主张。而之所以在“人文”后面缀以“主义”，则是为了避免与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经常标举的“人文精神”相混淆。按照论者的解释，“人文主义”的人文文化，特指与中国人文传统一脉相通的那种文化类型。中国传统文化，自来就有“天文”与“人文”之分，而且强调二者的功能亦有所区别，即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贲》）。这种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技术文化以及商贸文化不同，它所关注的一向都是人性、生命、社会历史的健全发展问题，尊奉的是通达形而上领域的信仰伦理，在文化内涵和思维方法上，都与前者有别。明晓了这些，大概就可以知道，这种文化对于人性、生命以及社会历史健全发展具有何等的必要性。人类在不断进化，但必伴随着难以规避的异化，而人文文化，则

是其规避和矫正种种异化倾向的可靠保障。无论人类发展史会实现多少次自我超越,人文文化都将伴随其始终。

如果检视一下人类发展史,无论中外,我们都会发现一个近乎相同的现象,那就是每一次历史的巨大变革和进步,包括科学技术的重大发展,都会伴随出现传统人文观念、伦理秩序被解构的局面。这些人文性的既有存在,必然会成为某种羁绊和束缚。不破则不能立,这是一种正常和必然的现象,或者说是历史进步的代价。相较而言,中国历史的现代转型和现代化追求的科技进步,在这方面比西方尤甚。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的人文传统较西方更为自觉,甚至形成了更为厚重的文化心理积淀;另一方面中国与西方存在着巨大落差,有识者左冲右突,屡战屡败,最后把原因归结到了人文性的中国传统文化,从而把它设置为实现历史变革的主要突击目标。因此,众所周知,对人文文化传统的彻底否定和猛烈批判,就成了现代历史变革的一个重要特色。西方的东西大量涌入,难免消化不良;而现代性的变动,人们因缺乏心理的准备又难免进退失据,这就形成了一时间的文化失范和人文文化日渐失落的社会现象。该书论者选取了被主流学者长期忽略这一历史文化情境,并着重考察因此而产生的人文文化倾向在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中的表现和作用,其意义当是不言自明的。

该论著用大量篇幅对现代文学发展中人文主义诉求的丰富表现和观念表述,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考察与辨析,为人们逐次展开了全新的文学世界和价值视域。尤其是书中对郁达夫、老舍、沈从文、冯至、张爱玲、萧红、师陀等人们耳熟能详的代表性作家的人文主义特色,一一进行的近乎全新的解读和阐释,更不能不令人顿生耳目一新之感。论者不仅擅长思辨,而且具有敏锐的文学悟解力,其对价值论析的独到和对作家与创作的透彻解读,大概即缘于此。

当然,我也要说,论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毕竟还属初步,要把这一论题研究得更为透彻,还须进一步的努力。但我也相信,有了好的起点,离更大的成功应该不会太远。

2015.6.15

前言

人文主义是伴随历史发展始终存在的一种文化倾向。人类智慧所凝结成的人文思潮与科学思潮相互制衡补偿推动历史的平衡发展,是历史的结构性存在。当历史发展形成对人文文化的冲击时,对人文倾向的张扬就显得尤为必要。特别是在历史现代转型时期的中国,这种人文文化的失落更是前所未有。中国历史的现代转型是特指中国社会近代以来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历史转变,本书将其时间界定为19世末期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众所周知,中国历史文化现代转型的发生不是其本身自然孕育发展的结果,而是在遭受西方列强的军事与文化侵略后被动应对的行为。在切肤之痛中,历史变革的先驱人物感受到西方文化科技的先进,认为只有向西方学习才能彻底改变中国的命运。基于这一理解,就势在必然地形成了“中/西、古/今”的认识模式,即凡是中国的就是落后的,就要被革除,凡西方的就是先进的就要引进,以为唯其革除传统引进新知才能完成民族复兴。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质就是人文文化,所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其矛头所指首先就是传统的人文文化,这使中国现代文化变革从一开始就表现出醒目的伦理革命倾向。因此,这种历史发展的片面合理性所形成的对人文文化的冲击不仅空前激剧,而且其对历史的平衡发展所形成的阻碍也是显而易见的。但也正因如此,又必然地激发了人文主义思潮对历史激进主义的对峙与抗衡;而且对人文文化的冲击越是强大,人文主义思潮对历史的纠弊与补偿就越发弥足珍贵。人文文化倾向在文学场域中有着丰富而深刻的表现,它构成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中不容忽视的意义构成和文学景观。

但是,历史逻辑常常习惯于从统合主义角度来对边缘性的历史现象进行遮蔽,对相左于历史主流的文化现象的评价自然也失于偏颇。近一个世纪以来,在作为主导性力量的文化启蒙与政治革命的观念意识及思维模式的制导下,人文主义思潮成为长期以来被严重遮蔽的历史价值视阈。其间,坚持人文主义立场

的批评家、作家的抗衡性言说虽不绝如缕,但始终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主流观念一统天下的局面。这种统合主义的遮蔽在文学研究领域不仅窄化了人们的价值视阈,而且长期左右着研究者的认识模式,严重地影响着对人文主义思潮的准确评价和文学史的科学建构。因此,对这一价值视阈的揭示和完整准确把握是迄今为止仍然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近几年来学术界对人文主义的关注形成了一股新的热潮。20世纪80年代,虽然有过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但是,就实而论,当时对“人文精神”的讨论还不是我们所讲的“人文主义”的自觉,依然是从启蒙主义的认识角度对“人”的个性自觉和自主精神的强调,而真正的人文主义思潮则关注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宇宙的关系平衡,并非仅仅强调人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诉求。近几年来“人文主义”开始成为人们自觉关注的学术对象,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范畴,也开始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使用。在这种新的研究中虽然也存在着对“人文主义”理解的过度泛化,存在对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把握不清的状况,但是从发展趋势上看,也在一步步趋近准确的理解和阐释。这期间,这方面的域外著作被自觉引进,比如英国学者阿伦·布洛克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就是一个很具说服力的代表。该著作对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历史发展进行了清晰的梳理,对人文主义的内涵和外延则更是做出了较为准确的把握与阐释。在中国理论界,对人文主义的梳理和把握较为系统的著作是尤西林的《人文科学导论》。在更准确意义上对人文主义价值视阈做出揭示的是孔范今的论文《论中国现代人文主义视域中文学的生成与发展》,该论文对人文主义概念做出了细致到位的梳理和把握,并在这一新视阈内阐释了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中,人文主义倾向的具体存在状态、发生的历史机制及其深在的价值意义。但是,就这一学术课题的研究而言,应该说这还仅仅是个开始,要对中国文学现代转型时期的人文主义问题做深入系统的研究还需要更多扎实细致的努力。

本书试图对人文主义的相关理论进行系统性的历史考辨,其中包括对西方人文主义理论的重点考察和对中国人文主义特别是中国历史现代转型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做必要的历史考察并对其进行类型分析。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是一个贯穿于20世纪前后的漫长历史过程,本文着重关注的是其前期即现代时期,并对其中某些有代表性的作家进行深入细化的个案研究。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总论,由对“人文主义”这一核心价值范畴的把握、对人文主义思潮的重点历史考察和人文主义倾向在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实践中的丰富表现三个层面

结构而成。第二部分是个案研究,对中国现代时期的几个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家进行个案分析并分章进行论述,其中包括郁达夫、老舍、沈从文、冯至、张爱玲、萧红、师陀。

从本质上说,人文主义是指一种价值指向,其终极关怀在于维护人性中非理性与理性、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宇宙的结构平衡,对人类存在的多元观照是其区别于其他文化范畴的根本内质。在历史文化功能上看,人文主义的终极历史文化功能在于抗衡历史统合主义的极端性及其所引发的人性异化与历史的结构失衡。在思维方式层面上,人文主义是一种悟性或诗性思维,其区别于逻辑思维,是人类把握世界的重要思维方式之一。

中国文学现代转型时期所形成的人文主义思潮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伦理型人文主义,另外一种是自然型人文主义,这两种类型的人文主义从两个方面对人性的健康存在进行维护:伦理型人文主义维护人性自身、人与社会的和谐;自然型人文主义则着重观照人与自然宇宙的交流共处。人文主义倾向这两种类型的形成是对中国历史现代转型时期历史缺失的自觉应对,其在中国历史现代转型中思想文化层面的表现就是20世纪20年代的“科玄论战”与学衡派的“新人文主义”思潮的涌现。“科玄论战”所争论的焦点正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对待自然与人生的不同态度。玄学派所坚守的是人与自然宇宙间神秘交流方式的保留,维护人性中的非理性存在,即维护人生观的多样性,抗衡科学文化对人性中非理性存在的祛除。学衡派之人文主义则宣扬伦理在社会历史与民族存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重唤传统伦理的复建。

在中国文学现代转型时期的文学场域中,人文主义思潮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形态。在文学观念上,人文主义坚守文学的本体性价值,反对文学的功利化倾向;人文主义坚持对人性多样性的自由观照,突破了启蒙文学的“国民性”与左翼文学的“阶级性”视角;人文主义的文化观念还注重人生的现实状态,再现现实社会、历史语境之下人生的冲突纠葛,寻找永恒的精神家园,这也与启蒙主义、左翼文学的批判与改造意图相左;人文主义者还关注人与自然、宇宙的关系范畴。

20世纪文学场域中,在人文主义文学观念的丰饶沃土上催生了恣意斑斓的文学创作样态,这些创作从内容上可以划分为六个方面:1. 知识分子的现实困境与精神失落;2. 城市现代转型中伦理失范的真实呈现;3. 乡村秩序的破产;4. 人与自然的隔绝;5. 以对美好人性的文学想象对抗历史的失衡;6. 以历史循环观对抗线性历史进步观。

20 世纪的文学场域涌现出了众多具有明显人文倾向的作家,如郁达夫、老舍、沈从文、冯至、张爱玲、萧红、师陀等,这些作家中的大多数在其创作的初期都有追步主流文学观念的意图,但最终又都转向了人文主义的价值立场。面对复杂的历史和社会缺失,他们做出了侧重不同的观照与思考。

郁达夫的创作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前期创作传达出坚决而明朗的浪漫主义精神指向。20 世纪 20 年代末,郁达夫在选择浪漫主义式疏离的同时,其创作指向逐渐从浪漫主义悲情式的对历史的质疑与解构的向度,转入带有浓厚人文意味的文化救赎。这种文化救赎是郁达夫所倡导的新浪漫主义对浪漫主义弊端的补救,是对传统人文文化伦理维度的彰显。

根据老舍从初登文坛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的观念表述和创作实践可以看出,他固然有着跟随国内文化主导潮流的意愿和实际努力,但从一开始即已表现出与之不同的观察角度和价值建构。相对于启蒙主义文化“中/西”、“古/今”的单向度价值设置和决绝的历史态度而言,老舍的创作则表现为结构性双面关注的特点。尤其是面对失落的文明及其业已衍生成的后果,表现出了更为警醒的意识,并对其给予了高度自觉的关注,从而彰显出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看来都极为难得的人文主义态度与觉悟。

沈从文在 20 世纪 20 年代针对左翼文学阵营对文坛的强力统合,异帜昭彰地坚守着自我的创作立场,其创作主旨就是对抗中国历史现代转型所产生的现代都市科技工商文明对人性的异化。由于这种鲜明的与历史线性进化观相对峙的人文性立场,沈从文的创作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和遮蔽。新时期以来,对沈从文创作的研究从未降温,但是对沈从文的认识都集中于对其地域文化观念的评说,而较少从人文立场,尤其是较少从与其地域文化观念密切相关的带有原始意味的诗性思维方式入手来对其进行解读。

冯至是一个一生都不断寻求精神上自我超越的诗人。他将自己的创作高峰确定为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创作《北游》和 20 世纪 40 年代创作《十四行诗》、《山水》、《伍子胥》两个时期。纵观他创作的两个高峰时期的精神关联,则不难厘清作家的精神发展历程和之间的逻辑关系。实际上,20 世纪 20 年代,冯至创作主旨都是在表达作家的精神失落,这种失落感不单单来自诗人对当时社会现实层面的体认,更为重要的是诗人凭借他天生的敏锐感触到了中国社会进入现代性进程之后,现代文明恣意横生,传统文化痛遭失根所导致的整个民族的精神迷失。这种彷徨与痛苦使得诗人不得不远离故乡去寻求一个答案。于是,沉寂 10

年之后他再次迎来创作高潮。20世纪40年代,冯至的创作表达了作家对中国社会文明重建的深刻思考与探索,诗人在中西文化的精华中找到了两者和谐与相通之处,并将其在自己的创作中完美地表达了出来。寻求民族精神的故乡,这是冯至一生致力不懈追索的方向。

在张爱玲研究中,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她对历史新旧交替时期人性异化的冷峻审视和才艺非凡的艺术表现。应该说,这种理解确实切中了张爱玲小说创作的一个基本特征。但是,当我们把张爱玲及其创作仅仅放置于冷峻批判的层面来理解她时,却又觉得不完全是那么回事。而且,仅止于对其“批判性”表现的研究,也势必会阻止对其价值立场和意义指向的深层辨析。因为众所周知,对所谓“批判”这一概念的使用及对其作为工具性价值的期待,原本属于从启蒙文学到革命文学这一主流文学流脉的基本特征,倘若只是注重于从批判的范畴考量张爱玲小说的价值呈现,则不仅难于摆脱主流文学的认知模式,而且极易造成错位性的评价。事实上,张爱玲的创作根本就不属于主流文学的一脉,不然的话也不至于长期为主流文学所遮蔽。如果我们细心体味她对历史文明发展状况的感喟和作品中所充溢着的无尽苍凉,就会发现她既不同于启蒙主义文学的“国民性”关注,也不同于革命文学的政治性批判,而是由人文主义的立场出发,对人性在历史现代化发展中的悲剧性生存给予了最切近对象本真状态的关注以及深切的悲悯关怀。

萧红小说创作中跟进启蒙与左翼主流文学话语与其超越主流文学话语的矛盾性已被学界充分关注。萧红口述、骆宾基代笔的小说《红玻璃的故事》也多次从女性以及人类命运的视角被解读。实际上,《红玻璃的故事》这部小说所关注的主题与《生死场》、《呼兰河传》颇为一致,都是聚焦东北乡村农民的生存状况与农民的精神改造。将三部小说在此主题上联系起来,可以清晰地解读出萧红在农民生存状态和农民精神改造这一主题上的思想转变。从其思想转变中不难推断出萧红对主流文学话语的态度并非仅仅是陷于矛盾与纠结之中,而是最终走向了对启蒙与左翼文学历史功利性意图的自觉反思。

师陀的创作中有三个重要的意象——“车站”、“塔”与“深宅”。这三个意象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意象结构,反映出作家“外来文明—人文文化—封建纲常秩序”三维互参的多元文化心理结构,展现出作家对于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复杂认知与态度。同时,师陀的这种文化心理结构也相应存在于以“小城”为原型进入文学想象的其他具有人文性倾向作家的创作中。这种多元文化心理结构模式

形成于“小城”所独具的历史文化空间,成就了小城叙事在现代文学场域中的独特价值。

人文主义创作对历史现代性给中国社会造成的文化精神危机进行了深刻反思,彰显了传统文化的价值意义,重新思考了中西文化的融合与重建问题,为民族与人类的存在与发展拓展了新的精神维度。在中国历史现代转型中,新文学人文主义倾向是适应中国历史、文化、文学的结构性变革而产生的结果,在历史文化范畴内其功能价值在于制衡与补偿启蒙与左翼思潮中存在的极端西化与意识形态化的不足,在文学范畴中其功能价值在于维护文学的本体性价值与文学的自由精神,制衡主流文学话语的统合性倾向。

目 录

前 言	001
第一章 中国文学现代转型时期人文主义倾向的基本历史考察	001
一、人文主义核心范畴的必要阐释	001
1. 人文主义倾向的准确理解	001
2. 人文主义倾向的类型划分	006
二、人文主义思潮的重点历史考察	008
1. 思想文化层面的对峙	008
2. 文学观念的交锋	015
三、文学创作实践的丰富表现	025
1. 知识分子的现实困境与精神失落	026
2. 城市现代转型中伦理失范的真实呈现	026
3. 乡村秩序的破产	029
4. 人与自然的隔绝	031
5. 以对美好人性的文学想象对抗历史的失衡	032
6. 以历史循环论对抗线性历史进步观	037
第二章 从浪漫主义反抗到人文主义救赎——郁达夫创作的精神转向	040
一、精神转向：从浪漫主义激情到文学的道德感	040
二、创作精神转变的内在逻辑	047
第三章 人文主义视野中的独特历史关注——对老舍创作倾向的重新体认	053
一、世界变革格局中的独特姿态与文学发言	054
二、面对传统文明失落的人文沉思	058
三、对生命存在的深切关注	063

第四章 沈从文的诗性思维和人文建构·····	068
一、带有原初意味的诗性思维·····	071
1. 互渗性的思维特性·····	072
2. 通悟的认识能力·····	074
3. 沈从文诗性思维的纯粹性·····	075
二、沈从文的人文建构·····	078
1. 对神性的诉求·····	079
2. 旺盛的生命力与平衡美好的人性·····	085
3. 对历史发展中“常”与“变”的思索·····	091
4. 诗性·····	094
第五章 重寻精神的故乡——冯至创作的精神内核·····	096
一、“故乡”的含义·····	096
1. “故乡”的含义之一：自然之乡·····	097
2. “故乡”的含义之二：伦理之乡·····	101
二、通往故乡的道路·····	105
1. 回归自然之乡·····	105
2. 回归伦理之乡·····	108
第六章 人文立场下的悲悯与关怀——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基本倾向·····	113
一、人文价值视阈与张爱玲研究·····	113
二、大家族背景下人性的存在状态·····	116
三、中西文化碰撞下失落的灵魂·····	124
四、城乡文明的对立·····	134
第七章 萧红对主流文学话语的反思——从《生死场》、《呼兰河传》到 《红玻璃的故事》·····	144
一、三个文本中的思想转变·····	144
二、思想转变的原因·····	151
第八章 车站、塔、深宅——师陀创作中二元文明冲突下形成的三维 文化心理·····	154
一、“车站”、“塔”与“深宅”的三维意象结构·····	154
二、多维互参的文化心理·····	160
参考文献·····	164
跋·····	168

中国文学现代转型时期人文主义倾向的基本历史考察

一、人文主义核心范畴的必要阐释

对“人文主义”这一概念内涵和外延进行把握十分困难,在不同的价值视阈中,研究主体对该概念内涵和外延的界定有明显的差异。英国学者阿伦·布洛克曾对人文主义下过这样的断言:“作为暂行的假设,我姑且不把人文主义当作一种思想派别或哲学学说,而是当作一种宽泛的倾向,一个思想和信仰的维度,一场持续不断的辩论。”^①由于人文主义存在的历史复杂性,对人文主义概念的沿用就出现了很多混乱越界的现象,例如,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人文主义内涵的一个重要核心内容是自由理性,而自 19 世纪后半叶始,在对人文主义的理解中,非理性则取代了自由理性成为人文主义这一概念的核心范畴。前者被称为“启蒙的人文主义”,后者被称为“人本主义的人文主义”(“人本主义的人文主义”即“卢梭式的人文主义”,属于人文主义范畴而区别于“人本主义”这一概念),两者在内涵上虽有交集,但具有本质性差异,却被统称为人文主义。这种对人文主义范畴理解的过度泛化,造成了很多研究上的遮蔽与误读。

1. 人文主义倾向的准确理解

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人文主义倾向,首先要廓清的就是什么是人文主义。《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这样阐释人文主义:

^① 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3 页。

凡重视人与上帝的关系、人与自由意志和人对于自然的优越性的态度，都是人文主义。从哲学上讲，人文主义以人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人文主义从复古活动中获得启发，注重人对于真与善的追求。人文主义扬弃偏狭的哲学系统、宗教教条和抽象推理，重视人的价值。^①

这一阐释对人文主义的特征多有指涉，其中有对人文主义内涵的确切表述，但也存在与其他概念的混同、越界与窄化的问题。那么人文主义究竟是什么？我们可以根据《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所给定的概念框架进行进一步梳理。

人文主义首先是一种信念伦理。孔范今在谈到人文文化的信念伦理范畴时讲到人文主义“不相信理性(科学)万能，也不相信‘人’的力量可以主宰一切，相反，对于未可知的世界和人类命运倒是永怀着一种虔诚的敬畏之心，且把人文关怀和对人文信念的自觉持守与践行，看作个体生命乃至人类全体对随时都可能发生的异化危机的自我救赎。人文文化的价值认同几乎无不指向一种伦理性信念，或者毋宁说是一种超越时空的永恒性信仰，但这种信念(信仰)却会因地域文化特征的差异和人文文化传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②。实际上，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天”就有信念伦理的内涵，例如孔子所谓“主宰之天”就是指涉信仰伦理。人文文化具有对现实人生和历史功利性的超越性，它与科学文化的显在差异也在于此。科学文化是一种工具理性，它仅仅关注人类行为实际的功利性目的，但是人文文化关注其价值意义，关注人类存在的终极性价值。正如尤西林所说：“工具理性作为实现满足欲求目标的工具，只关心这一实现过程的程序与条件，而不思考这一目标的价值意义，特别是不进一步深究或评估这一目标在人生与人类整体中的地位。但人类理性最高的功能形态却是价值理性，即对自己活动目标做出整体性的与终极性的价值意义评估。”^③人文文化所关注的人类终极性价值就是人性自身的健全与平衡，人类社会的和谐以及人对宇宙自然的敬畏与交流的通畅。在历史的发展中它作为人类自身所产生的针对异化的救赎力量，是对人类自身匮乏的一种补偿，是人类本体意义的体现。“有无信仰，是人兽区别之一，这不仅是终极(本体)价值判断，也是人类学意义普遍与基

①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卷6)，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760—761页。

② 孔范今：《论中国现代人文主义视域中的文学生成与发展》，《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

③ 尤西林：《人文科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本的文化功能判断。”^①因此,人文文化作为人类存在发展中的永恒性价值体系,属于信仰伦理的范畴,作为一种文化信仰,它一直存在于不同的历史文化形态之中。

其次,《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给出的概念中提到了“生命意识”,这也是人文文化的重要范畴之一。人文文化是以“生命、人性为基点所构成的生命意识”^②,除了理性之外,人文文化也强调人的自由意志、情感信仰等非理性人性因素对人的重要性,维护人性的健全发展和生命和谐旺盛的存在状态。正如孔范今在界定人文主义特征时所说:“人文文化也非常看重‘人’的价值和人之可贵之处,但它是由尊重生命和企望人性健全发展的角度来理解这一切的。”^③科学理性也观照生命,但是它将生命置于纯粹理性的范畴之中进行切割分析,忽略了生命本身的完整性、圆融性,并且极端地认为理性是人类获得本体价值的根本手段,是人性中最为重要的存在因素,只有理性的解放才是人类解放自身的根本途径,是生命得以健全发展的根本保障。科学理性对理性的极端推重,以压抑人性非理性因素为代价,造成了人性的异化状态。人文文化对人的自由意志、情感信仰等非理性生命意识的高扬就是对科学理性异化生命的反驳与对抗。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伴随现代性矛盾所兴起的人文主义思潮,从卢梭、赫尔德、康德、席勒到马克思,其反思批判正是以对人的分裂(异化)为中轴展开的。”^④因此,人文文化所注重的生命,是人性中的理性与非理性相互和谐,理智与情感相互协调的健康而自然的生命状态。

再次,《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所界定的人文主义概念,在比较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把握世界方式的时候也触及了人文文化的重要特征,即以诗性思维把握世界:“人文主义扬弃褊狭的哲学系统、宗教教条抽象推理,重视人的价值。”在此,它强调了人文主义把握世界的独特能力。人文文化对世界的认识和把握是基于想象和通悟的方式,它是人类在幼年时期就具有的认识和把握世界的能力,这种思维能力起初被意大利哲学家维柯首次提出并命名为“诗性智慧”。这种智慧的重要特征首先是互渗性,也就是维柯所谓的“诗性”。法国人类学家路先·

① 尤西林:《人文科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

② 孔范今:《论中国现代人文主义视域中的文学生成与发展》,《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

③ 孔范今:《论中国现代人文主义视域中的文学生成与发展》,《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

④ 尤西林:《人文学科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0页。

列维-布留尔指出,原始人在认识事物的时候,客体与主体、存在与意识都是交织在一起的,这种“你”“我”不分的思维形式使得人类以形象和想象的方式认识世界、把握世界,从而将客体世界与主体世界的内在联系维系起来。其次,诗性智慧认识世界的另外一个显著特征是心理感悟,也就是所谓的通悟。原始人没有文化积累,所以他们对事物的判断都是基于心理主体而非文化主体,也就是说原始人对事物的认识和判断都是从心理感受出发,是对事物的当下判断,而不是以知识文化为中介对事物进行理性抽象的判断。这种判断有直接性,是一种直感,是人类把握世界的特殊能力,也就是后来胡塞尔特别强调的“本质直观”。胡塞尔认为:“直觉由于是非过程性的瞬间感悟,而具有‘领悟’(突然发觉的洞识)或禅宗‘顿悟’(当下即得毋庸过程的特性)。”^①这种认识世界的能力一直存在于人类的思维中,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指出:“艺术家的意象表达的知觉的直觉,和原始的直觉分不开,毋宁是向那种直觉的复归。”^②它与理性思维一样是人类认识和把握世界的重要手段。想象与通悟的思维方式作为对理性思维的补偿具有理性思维所不能达到的认识世界的能力。爱因斯坦对这种思维方式做过这样的论述:“任何真正的创新都是逻辑概念之外的活动,它植根于同直接经验关联的‘尚未理解的东西的残余’。”^③

理性思维认识的有限性早在康德的哲学中就有明确的阐释。康德将理性的认识范畴局限在事物的表象世界之内,对于宇宙本体和彼岸世界以及人类自身的认识,理性则无能为力,而想象与通悟的能力则是人类认识自我和彼岸世界的有效手段。维柯认为,这种思维能力创造了人类早期的历史文化,创造了一个人与自然宇宙和谐存在的生存状态。但是由于人类理性思维的萌发,以及理性自身所具有的统合性,人类经常压抑这种想象与通悟的认识能力。源于诗性思维的特点,人文主义注重人与自然的内在关联性;源于这种思维的直感性—本质直观性,人文思维常常可通达至理性思维所不可达到的不可知世界之内,这就扩大了人的认识领域,使得人类在以理性思维创造物质世界的同时,又以悟性和想象的方式创造了一个关乎人类精神的世界,这个精神世界包括历史、哲学、文学等各种人文学科范畴,它甚至是科学思维生发的母基。诗性思维缔造了人类的审

① 尤西林:《人文学科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

② 梯利:《西方哲学史》,葛力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658页。

③ 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许良英等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98页。